

菜九段  
著

# 古史雜識



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 作者簡介

菜九段 男 生於一九五八年。

縣上山下鄉先進個人（安徽省當塗縣 1977）、醫學學士（安徽中醫學院）、醫學碩士（皖南醫學院）、編輯（江蘇古籍出版社、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著有詩集《混沌外的鄉愁》，歷史研究專著《秦楚綱鑒》（稿本）、《史記求真》（稿本）、《先秦列國史料匯編》（稿本）等。電子郵件 c9d002@163.com  
c9d001@yahoo.com.cn

大膽的假設  
小心的求證

通  
鑑

責任編輯 / 周躍  
裝幀設計 / 高山

有六分證據，說我  
多話，有七分證據，不  
能說八分話。

胡道

## 寫在前面

菜九推出這個小冊子是因為有話要說。而這些話大半是這些年來拉拉雜雜說過的，只是想以這個形式合在一起大說一通。

菜九乃菜九段之省稱，而菜九段作為網名，則是超級菜鳥之意。本意是說上網的水平極差，但也不妨推廣到其他各個方面。然而水平極差不等於沒有說話的權利。人總是要說話的，說多了總是會出錯的。我是菜鳥我怕誰，說錯了也不會引起太多的譏諷。而一旦說對說中，則頗能受到好評。這個小冊子中曾經刊發過的部分，或者表示超級菜鳥有時也會說出一些被人認為有點道理的話。

人這種動物總是會有歷史癖的。這一點也為網路上各歷史論壇都人氣鼎沸、高論低論層出不窮的景象所充分印證。記不得是接受了什麼高人的提示，自菜九也信奉了將人類的苦悶歸結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以後，才漸漸對這個人性特點有了自己的看法。這個所謂的歷史癖，其實也與解決人自身的苦悶有關。原來，因為到哪里去的問題，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說出來的皆當

不得真；所以不由自主且較爲執著地關心起相對明確的從哪里來的問題。於是，想搞人性研究的菜九跑到歷史的故紙堆裏挖山不止也就不足爲奇了。

說來有趣，菜九本因學醫不爽，便有心在人性方面作點探索；本來只是爲了更好地把握人性而熟悉歷史，不意發現了若干問題；本來只想挑幾個問題攢論文評職稱，結果職稱沒評上，問題倒攢了一大堆；本來想置這些問題於不顧，結果良心不安，便想盡己所能把這些問題統統揪出來，卻不曾想越揪越多，也就越陷越深，一直糾纏到現在，還不知到哪算是頭。一個毫無學術淵源的門外漢想解決一些學術問題肯定是自討苦吃，其間的磕磕絆絆以及重複了別人的勞動難以計數。但也有一個好處，即在這個過程中毫無顧忌，自得其樂，搞錯了也不會丟誰的臉，傷害到什麼人。好在有歷史癖的人性支撐，以及我們安徽胡適前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的指點，這些年下來，自認爲也小心求證出若干問題，同時也知道存在一些無法求證、只得存疑的問題。其實菜九求證問題的辦法很笨，但很管用，即將所有與問題相關的材料抄在一塊，問題往往一下子就凸現出來了。有時候，最笨的辦法常常就是最見效的辦法。每當這個辦法不斷奏效時，就不禁想起程千帆先生在評價《中華大典》工作性質時說的話：只要將材料以新的形式排列，就能產生新的價值（大意）。程老先生可能沒想到的是，像菜



九這樣把一個問題的全部材料集中並列，就無意中用上了胡適之先生的“以經解經”法，從而使得原本雷打不動的事實，也成了問題，並有可能給出全新的解釋。菜九的好運就在於，先是誤打誤撞用上了胡老先生的這個辦法，然後才知道胡老先生的這個說法。這或許應了那句老話，瞎眼的家雀天照應。但運氣歸運氣，暗中摸索的麻煩還是省不掉的。於是常常有今是昨非之憾，接下來是補不盡的漏洞，糾不完的錯。

儘管如此，菜九的感覺並不充滿苦澀，而是充滿欣慰。不僅僅是因為這些年來大膽假設每每蒙對了，更因為自己上佳的運氣。在菜九看來，如果想搗鼓出點玩藝兒，運氣比才氣更重要。須知，從古到今，比菜九根基好、才氣大、用力勤的人多到不可勝數，但皆因沒用上胡老先生的以經解經法，或歸於無所作爲。所以菜九向讀者諸君大力推介這個方法，如果你有歷史癖，又對現有解釋不滿，還想搞出點名堂，只要能把找得到的材料全部排開，你總會有所收穫，而且可能不小。這也是菜九出這本書的用心之一。同時菜九也期望這個小冊子能給腐敗猖獗的學術界注入一點生氣，給如菜九般有志向學的門外漢一個振奮，給菜九膜拜久遠的太史公一個交代，也算給菜九的安徽老鄉胡適之先生投個門生帖子。讀者諸君至此定會大笑不已——區區一小冊居然能被賦予如此多的負載，然而菜九自有癡人說夢的權利。

癡人說夢，出錯出醜是免不了的。在菜九以爲自己

蒙對了一些玩藝兒的時候，心裏其實也沒有太多的底氣。十多年前菜九寫歪詩的時候曾有《考古》一篇，有句云：“古應當考/我們豈能沒有自己的出處/古不可考/我們尚未達到足夠的高度”十多年下來，菜九肯定還是沒有達到足夠的高度，但也被考據癖驅使著搗鼓出這些篇什。人生的尷尬或許在於，即使沒有把握，也不能不作為。真要因為高度不夠而出醜露乖，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所以，讀者諸君如發現菜九的小冊子中有什麼說錯的地方，一定要給指點出來。拜託了。我的信箱：[c9d002@163.com](mailto:c9d002@163.com) [c9d001@yahoo.com.cn](mailto:c9d001@yahoo.com.cn)

# 目 錄

西周楚國初封及遷移原因解	(1)
僖十七年魯師滅項解	(11)
蘇秦相六國辨	(17)
樂毅破齊期間齊地存在狀況考辨	(29)
試論《觸龍說趙太后》的史實之偽	(40)
《史記》秦史獻疑拾誤	(52)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57)
《史記》秦二世朝史實窺謎	(66)
秦二世現象論	(72)
陳勝故里陽城考	(87)
秦代楚地吏治鬆懈芻議	(90)
有關呂后的神話	(100)
劉邦西進滅秦的戰爭線路及歷史功績辨析	(105)
劉邦趙高聯絡始末考論	(114)
試論三戶亡秦的歷史應驗	(124)
千古誰識《鴻門宴》	(134)
附 秦楚之際稱臣考	(144)
項羽分封新論	(145)
楚懷王心的歷史地位述略	(156)

附 尋找楚懷王.....	(168)
《漢書》辨誤二則.....	(171)
漢李必季必考.....	(178)
漢滅齊戰役考釋.....	(180)
項羽敗亡原因新探.....	(192)
附 解讀項羽.....	(203)
霸王別姬解.....	(207)
略論漢定天下過程中的呂氏武裝.....	(209)
《秦楚之際月表》考釋.....	(228)
《項羽本紀》識讀.....	(234)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釋讀.....	(256)
附 讀《惠景間侯者年表》.....	(279)
論以歷史的角度評價劉邦的個人品質與漢初文化.....	(280)
漢高祖三題.....	(292)
我來剝周昌的畫皮.....	(306)
古風探求.....	(309)
漢孝惠皇后身份辨.....	(312)
透視賈誼的小人本相.....	(315)
不可鄙薄司馬遷.....	(322)
皇帝的家譜.....	(325)
沈甸甸的武則天現象.....	(331)
金庸先生的貓膩.....	(338)
項橋失憶.....	(348)
不許有權人操歷史(代後記).....	(352)

# 西周楚國初封及遷移原因解

有關楚國在西周初年的始封地，尤其是楚都丹陽的爭議頗多，現在稍佔優勢的觀點是楚初建國於丹淅之交，即今河南淅川。由於此地與周初史迹不甚彌合，與後來楚之國勢發展殊為懸隔，使之不能得到確定。按《左傳·昭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說法，周楚之間的關係似一度相當不錯。但類似陳述與楚突然在南方發展的事實嚴重衝突，也與目前的研究結論無法調和。因此，楚研究始終存在著源頭不可解的困擾。其實，根據有關西周早期的歷史記載，似可隱約辨認出楚初封之地望及其遷移原因，現試解如下。

## 一、楚之領地及初封

楚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據童書業先生舉甲骨卜辭有“掃楚”字眼為證，表明楚民族在商代就以“楚”稱著於世。<sup>[1]</sup>周代以前，楚系分佈極廣，今在山東、河南東部等地都發現楚族繁衍的迹象。所以司馬遷論楚先世稱“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sup>[2]</sup>正說明了楚系散處各地的極其錯綜複雜的情況。這一點極其重要，有了這種認識，或可避免非定楚於某地的拘泥。“鬻熊子事文王”<sup>[3]</sup>一事提示，在周原不遠處有楚部

落存在。周文王徙鄆，淅川及本文後面設論之荊山均距此不遠，而鬻熊或就屬於這一部落。在追隨武王伐殷的部落聯盟中，楚的名號未廁其列，也表明了幾種可能：（一）楚臣屬於殷或持中立立場，（二）近周之楚不夠強大，不值得提起，（三）鬻熊家族在部落中未居主導地位。根據史料，筆者以為後兩種可能更接近實際。楚在周初開化程度不高，雖然最初受封的一批國家（如陳、杞等）楚不在內，但不等於楚人當時沒有地盤。司馬遷說：“周封八百。”<sup>[4]</sup>荀子說：“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sup>[5]</sup>應該說，這兩組數字都沒錯，前者是實際存在之約數，後者是得周封之實數。可以肯定，當時絕大多數舊國均未一一受封，周王室對它們存在狀態沒有干預。楚人也完全可以在沒有受封的情況下繼續在他們祖先經營的地盤上繁衍生息。上文所說的“辟在荊山”，指的就是這塊地盤。那麼，荊山究竟指的哪里呢？有人以為荊山在荊州一帶，<sup>[6]</sup>《中國歷史地圖集》確實明確標明這一地區有一荊山存在。<sup>[7]</sup>但此處與淅川懸隔過遠，其間山川河流過密，其距周昭王覆滅的漢水亦甚遠，此楚亦不可能對昭王的結局負任何責任。可是從楚人與管仲的對話上，他們並沒有把昭王覆滅的責任斷然推淨。<sup>[8]</sup>再看佔優勢的“淅川說”主張的丹淅交會處左近不見有荊山之名，倒是在淅川西北的商縣一帶確有叫荊山或楚山的地方。今人何光岳指認商縣一帶百里方圓內有楚山楚水等名稱者不下七八個。<sup>[9]</sup>凡持楚丹陽“淅川說”者都引用了《水經注·丹水》作為支持，《丹水》云：“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塚嶺山。”又說：“至於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此山也。”上洛（即今河南洛南縣）西南，地在商縣境至藍田境之間。楚山楚水集中出現在一地的唯一解釋，是楚

先民曾經生活於此。而春秋戰國時期，楚地未拓展至此。荊楚當時常混用，楚人曾在這一地區存在當無疑問。再看《中國歷史地圖集》，這一地區以北還有一荊山，其地更當華山以北，<sup>[10]</sup>與商縣呈南北垂直狀。如果將華山北之荊山與商縣及淅川連為一體，就現出一個南北垂直呈東南傾斜的相當廣大的區域，且正當宗周與成周中間。參之以周公奔楚的事迹，這塊區域較為合理。不論周公的出發地是宗周，還是成周，他進入楚地都相當方便。這塊區域與楚受封及封爵也沒有過大衝突。首先，楚之受封或不應理解為如齊、晉、魯、衛一般，是無地得封，它完全可以是周室對楚人既有生存空間予以名義上的確認。春秋時的邾國，直至隱公元年還未得王命即可為證——邾的地盤並不小，較之於早已受封之滕、薛還大得多。其次，楚之封地也不可拘泥於爵位等級之限定。時楚為蠻夷，名爵只能是子。如春秋莒子、徐男，其地均不小，所封不過為子為男；群舒、淮夷活動區域也很大，連名號也沒有。這種現象的產生，是歷史沿革的結果。開化程度較低的民族組織水平低下，他們無法與先進部落爭奪平曠富庶地域，只得在山區棲身。楚的情況正是如此，作為極少數得周封的國家之一，在等級封疆問題上，楚必須看作為例外。對司馬遷所說“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之論，<sup>[11]</sup>不必看得太認真。當時秦根本還沒有得封，齊則多達五侯之地。<sup>[12]</sup>秦之得封晚到周孝王時，<sup>[13]</sup>所以司馬遷只是泛泛而論，不可作精確解。那麼，楚之世居及初封地在華陰至商縣區域的推論，既符合文獻記載表述的相關條件，也與客觀歷史現象無違。

有關楚受封於成王時代已無爭議，但這裏牽涉到周公攝政歸政問題，其受封時限仍需一辨。即楚之受封究竟在周公

歸政前，還是在周公歸政後。從目前存有的文字記載中不能得出該時限的明證，或可以從周公奔楚這一事實推論楚受封當在周公攝政時可能更大。因為只有周公給予楚正式的名份，所以他落難時才可能到對他心懷感激的楚去躲過風頭。其實，周公對楚的貢獻恐怕還不局限於授封。童書業先生曾有楚人是東方種族、被周人硬遷至西方去的疑慮，理由是《逸周書·作雒解》有周公東征熊盈族十七國，俘回來九國的記載。<sup>[14]</sup>周初銘文有“隹王於伐楚伯在炎”字樣，炎即為日後的鄭，表明楚是東方民族，證實了童先生的估計。如果此事屬實，那麼這些西遷楚俘之一部，極有可能被周公分派給已在荊山地區定居的楚人。祖居荊山的楚族經此補充後，其規模驟然大增，具備了受封的條件。與受封相適應，西遷楚俘也極可能由周公指派從屬於鬻熊家族，使之從原本不強盛狀態一躍成為在部落中居主導地位的勢力，最終從王室接受封號。有關楚受封的具體情況，《史記·楚世家》稱：“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成王期間封異姓之事甚少，而舉文武勤勞之後嗣這種做法，倒更像武王克殷後封聖賢後人之舉。表明楚受封極有可能是直繼封聖賢後之後進行的。完全有理由將楚受封的時間定於周公東征取勝後、歸政前這個區間。而“封以子男之田”與“居丹陽”，意味著楚族要從原先居住的廣大區域向丹陽集聚。這個丹陽即為丹水之北邊，它可以是淅川，也可以是商縣以西、丹水源頭左近之地。這種結果也有可能是周人欲以名爵換取楚人領地的伎倆。當然，周與楚的這種約定是否能得到很好遵守尚屬疑問。因為周民人數也十分有限，他們並無能力全面接管原荊山的廣大區域。故楚人完全可以繼

續在他們早先的領地上活動，只是不再名正言順罷了。

至於周公奔楚之事，根據《左傳》的相關記載，已不再有疑問。只是此楚的具體位置爭議頗多。因事關楚初封地望，在此簡要作辨。根據以上論述，周公奔楚的時間當定於楚受封之後，這樣就排除了東征前管蔡流言及征東居楚的可能性。那麼，爭議的焦點就在於楚究竟是在漢水流域，還是在商縣、淅川一帶。今人王光鎬以為，周公所奔之楚，地在江漢。<sup>[15]</sup>理由是《左傳·昭七年》追記魯襄公訪楚前夢見周公祖而行。這種認識有拘泥於史料之嫌。魯昭公上溯魯襄公所之之楚固然在江漢之間，但不等於周公所至之楚亦在江漢。江漢之楚與王先生本人認同的楚初封浙川說，亦不可調和。所以周公祖而行之楚，完全可以理解為一政治概念，而不必硬解為地理概念。如果這個見解可以成立，本文所論楚之初封地與《左傳》相關內容就不發生衝突。而春秋時楚與魯關係甚密是否也暗示楚對周公的感激之情。

## 二、楚人南遷的成因

楚國受封後、南遷前的史迹除了周公奔楚之外，還有《國語·晉語八》“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蕘，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楚世家》“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左傳·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此後，便是昭王南征的事迹。根據上述記載，現在的通行認識是，西周初年周楚關係相當和睦。但這種認識與楚人莫詳其故地放棄他們世代經營的故土大舉南遷的事實嚴重對立。筆者以為，周公封楚、奔楚與楚人南遷之間或者存在著有機聯繫。

司馬遷曾說過：“幽厲以往尚矣。”<sup>[16]</sup>意即為年代久遠，其有關傳聞不可盡信。對於《左傳》熊繹事康王云云，司馬遷略援為“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寶器”。<sup>[17]</sup>此論既可以理解為對《左傳》內容的意摘，亦可以理解為司馬遷對“並事康王”一說的不信服。《楚世家》中，楚國君主數度表露出來的怨氣值得注意。熊渠與武王俱稱“我蠻夷也”，靈王抱怨周不授楚寶器。如果將此怨氣與周昭王伐楚事件相聯繫，或許能對楚受封後的周楚關係作出另一番評判。

有關昭王伐楚之事，《竹書紀年》、《呂氏春秋》皆有明文，《左傳·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興師問罪的藉口，此事的真實性無可懷疑。據《古本竹書紀年》，<sup>[17]</sup>昭王伐楚兩次，其地均在漢水以南。這個地理位置雖與前文所論有抵牾，但完全可能是在昭王伐楚之前的周王室的某些軍事進剿造成的效果。作為一個新興國家，楚早期的國力相當微弱，顯非周王室之敵。這種情勢表明，楚不會主動開罪於周，後世楚君所說“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也說明了楚對周所取姿態。一旦周楚起衝突，楚肯定非周之敵。值得注意的是，昭王伐楚的規模（喪六師於漢）遠遠超出了懲戒需要，說其目的是旨在將楚消滅，並不過分。據此，不能斷言，在昭王之前周室沒有類似做法。在勢力不敵的情勢下，楚欲生存，只有退卻一途。江漢一帶，或就是楚在周壓迫下漸次退卻的終端。那麼，楚究竟犯了什麼大罪，致使周王室必欲滅之而後甘？此事還是與周公奔楚有關。衆所周知，周武王伐殷的藉口是商紂失德，周立國後時時以有德標榜自居，這在周代的文獻中隨處可見。而周公奔楚這一事件，無疑給周王室一貫標榜的形象留下一片污漬。為了消彌這種不良印象，王室對周公一族實行了厚封。除了

魯及王畿內的封地周外（或許還有一些未被人知的畿內封國），周公後人得國號者另有七處：凡、蔣、邢、茅、胙、祭、<sup>[18]</sup>沈（周公孫始封，約在今安徽臨泉），<sup>[19]</sup>其數量已大大超過武王後嗣得封者（邘、晉、應、韓），此等有賄賂之嫌的舉措，當可以在周室化境之內消除其失德的不良影響。但對詳知其情又非嫡系的楚國，周室採取了完全相反的舉措。一則因為楚開化程度低，周不屑於對其行賄；二則因為楚與外界交往或許不多，又處宗周、成周之間，很容易武力解決。所以周室準備“殺人滅口”。只是周的這番私心在周公未死之前不便實施。據《今本竹書紀年》，<sup>[20]</sup>周公死於歸政後十四年，周室對楚的軍事解決必在此之後。這裏必須對“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sup>[21]</sup>一說作出解釋。根據《今本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即周公歸政後之元年，王師滅唐；成王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十四年，秦師克曲。雖然此書的可信度並不為人稱道，但至少透露出當時天下並不太平，其情狀與周新定天下亦相合。所以，“刑錯四十餘年不用”，當與天下未集、周公平亂的局勢相比較才成立。其真實含義是，一沒有出現公然的叛亂，二沒有大規模武裝衝突。而周對近在肘腋之楚的軍事摧毀，完全可以悄悄地進行。《周本紀》對昭王覆滅的評語耐人尋味：“其卒不赴告，諱之也。”這裏諱言什麼？也許是大失顏面的潰敗，也許是伐楚的原因，也許兩者都是。如果不是管仲的問罪，如果不是《呂氏春秋》的記載，如果不是汲塚古墓的發掘，周楚的這段歷史確實會被周王室有意埋沒。

看來周王室對此事之諱相當深，而被伐之楚也沒有一字提及此事，其情形或許是莫名其妙。由於昭王伐楚的明證，後世將西周金文中出現的“從王伐荆”之類文字均歸於昭王時

代。這種做法本身有囿於現有史料之嫌。筆者以為，周之伐楚只是終於昭王（周穆王伐楚事，傳說成分多於真實成分），而非肯定始於或僅限於昭王。周王室的最初伐楚地點當在商縣附近之荊山，昭王對漢南之楚的討伐，僅能視作為一連串軍事行動的尾聲。欲證明這一點，我們必須理性地回顧楚初受封的時態。首先，楚對周王室的態度。在經歷了周公封楚、奔楚、返周，並再度大受尊崇之後，楚與周的關係應進一步親密。至少楚不會主動向周尋釁。直到春秋初期，楚對近側之隨國尚存憚忌之心。很難想象，它會在西周初期敢對強大的王朝稍有不敬。金文中出現的伐反荊等字眼，只能理解為周室用兵的藉口。其次，楚的地理位置。如果楚遠在漢南，且不說它不敢反，即便敢反，其能量有多大不難想見，是否能驚動王室更屬疑問。真的出現這種局面，周室只需下道詔令，漢南之楚的周邊國家隨、呂、鄧、權等就足以令楚服貼，而不必由王室大舉親征，大動干戈。如果楚近在淅川或其以西北，它更沒有理由主動叛周。其三，楚的長遠目標。根據幾代楚王對周王室未予楚寶器耿耿於懷一事來看，楚對周王室進一步提高規格的冊封應很執著。這在周初是一種很實際的利益，當時楚人的境界也不會超越實際而高遠起來。有一種論點認為，楚人是為了取得獨立發展的千秋大業而離開北方向江漢間遷徙。<sup>[22]</sup>但這種論點是依照楚族的終於發達而得的逆向臆斷，不足為憑。作為一個新興民族，楚人是否有這種覺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楚人是否有這樣做的便利；搬遷又是恥辱的標誌，毅然拋捨世代基業，楚人是否有這樣的決斷；在沒有外在壓迫的情況下，楚人是否願意承擔前往陌生惡劣環境的風險。如果充分考慮這些因素的存在，後人就決不會把深謀遠慮的